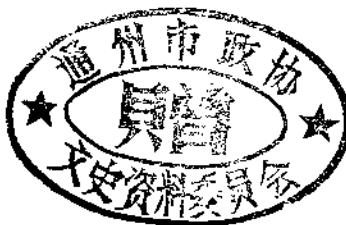


通州文史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通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5年11月

主 编：余学广 高志华

封面题字：王礼贤

封面设计：江 流

《通州文史》第十二辑

承 印：如 东 县 彩 印 厂

准印证：苏通东出准字(1996)第1号

印 数：2000 工本费：5.70元

目 录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缅怀共同战斗的良师益友

——兼述抗战初期的“特总”往事

.....	张德云	(1)
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三十二纵队 的兴亡	陈克强	(37)
张爱萍将军书赠《东进》记	陆伯生	(46)
抗战期间通海地区的杂牌部队	顾人和	(50)
我所目睹的日寇侵略暴行	陈丕勋	(57)
日寇六犯三余镇	黄企舟	(62)
忆杨港一次歼灭战	丁超一	(67)
抗战中创办的骑岸中学	丁宪明 陈震林	(69)
江总书记一家和南通	陆伯生	(74)
邹韬奋先生在南通县	姜 杰	(79)
怀念周一峰同志	姜 杰	(84)

- 忆张小圃烈士 丁超一 (90)
张自健八载风云记 李达山 (93)
顾佐卿的一生 陶允昌 (105)

- 往事钩沉忆先父 孙蜀生 (116)
附录： (一) 沧园记 (122)
 (二) 金沙育婴堂记 (124)
 (三) 孙氏私立小学校记 (126)
 (四) 甲骨文部分联句 (128)
孙儆与地方事业 季子 (129)
我所知道的金沙游民工厂 谢玮祖 (138)
戏剧与金沙忆往 孙蜀生 (142)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通的合作社 (二)

- 乡镇合作社和专营合作社
..... 蔡麟卿 (147)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通的合作社 (三)

- 南通县合作社联合社
..... 蔡麟卿 (156)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通的合作社（四）

- 南通县合作社联合社与南通金融界的交往 蔡麟卿（178）

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 先进教育工作者邢德文事略 张保丰（187）
追忆王炯老师 孙 钢（213）
王芳圃善举事略 李秀升（220）

缅怀共同战斗的良师益友

——兼述抗战初期的“特总”往事

张德云

今年是我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50年前，西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了8年浴血奋战，蒙受巨大牺牲，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谱写出伟大悲壮的史篇。这不仅是我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的空前伟大胜利，对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也有着积极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如今，她屹立在地球东方，全国人民正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奋勇前进，越来越为全世界所瞩目！

在纪念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之际，回顾50年前那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不仅激起我对南通的深挚情感，祝愿第二故乡在新的时代昌盛繁荣，更为使我心潮澎湃的是，在通海大地上进行抗日活动的经历中，结识了众多良师益友。他们引导我参加了革命队伍，使我从迷茫中走向了光明。往事历历，记忆犹新。

1938年是我永生难忘的年代。那年3月17日凌晨，日本侵略军从狼山脚下登陆，先后侵占了通如海启县城，继之又侵占南通县的刘桥、石港、西亭、酒店、金沙和通如公路线上的唐闸、平潮、白蒲等市镇及沿江的港口集镇。从4月初开始，日寇从各个据点出发，到处骚扰。敌人妄图以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等惨无人道的手段，使被侵略者屈服，然而却更加激起有志之士的义愤，纷纷在日寇盘踞之地燃起抗日烽火。通如海启一带曾是中共红十回军战斗的地方。许多老战士富有战斗经验。如施亚夫同志和他的老战友袁政清、王金标，率先发动天生港码头的工人、大生纱厂的机修工人，经常破坏天生港电厂的供电线路，使城闸港地区时常断电。在通如公路任家口地段，他们经常掘断路基，使日寇交通受阻。他

们的武器仅有几支短枪，更主要的是靠铁镐和钢丝钳。当时，我和丁维藩正在金沙以北、十总店之南的滥港桥附近。为了防备敌人袭扰，白天蛰伏在麦田里，啃点随手带出来的冷烧饼充饥，夜晚才能到农户家中吃顿饱饭。那时，十总店自卫队里有个名叫谢培之的班长同俞福基有联系，苦于没有经费，不能与俞手下的人集中到一起。四甲坝乡自卫队也因缺乏经费不能集中活动。丁维藩和我听到施亚夫等人在通西进行游击活动的情况后很受启发，认为必须集中一小部分人和武器来打击日寇。于是商定由丁维藩去掘港找当时的南通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葛覃，要求给个名义并拨发经费，以便集合一支部队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丁维藩原是保安司令部参谋，找葛覃要办的事他有把握可以办到。另一方面，由我到四甲坝去找姜彬，去东社北的白龙庙去找黄刚。丁维藩行前对我说：黄刚在南通城沦陷前，就持有保安司令部取消通缉土匪徐锦标的公文，劝说徐锦标率部投诚，参加抗日将功折罪。此时黄与徐正在一处。丁维藩还将自己的积蓄500元，交给我和俞福基，作为调集武装人员的费用。丁还再三叮嘱：集合到一批人枪，必须迅速袭击盘踞金沙、

骑岸等据点的日寇，造成声势以争取葛覃的信任与支持。我先去了四甲坝，姜彬答应听命于丁维藩，而且说至少可以集合起百余人枪，问题在于经费能否解决。我到白龙庙见到黄刚、徐锦标，其时他们面对“群龙无首”的局而正在观望。但是他们答应只要有名义、经费，也听候调遣。当时，经费之事确实是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组织人枪袭击金沙之敌的事，自然也就有了困难。恰巧这时来了个孙占彪，他是六甲自卫队的班长，听说白龙庙有一支游击队，就主动找上门来要求与游击队汇合一起奋力抗日。我和黄刚请他立即回去集合人枪，并从丁给我处理的500元中发给孙占彪200元。这在当时是够一个班的人员经费的。孙占彪率部来到，立即请缨去打鬼子。于是便由黄刚率领夜袭金沙。行动前我对孙占彪说：驻守金沙的日寇有一个小队，敌众我寡，此去只为扰乱敌人，只须虚张声势，不可硬攻。夜袭金沙之后，次日俞福基又带领谢培之的那个班夜袭了骑岸镇。他们的方法很巧妙，在骑岸镇街头挂上火油桶，在里面点燃起鞭炮，以声响迷惑敌人。同时，抛掷出几个手榴弹，算是真枪实弹。这场“攻势”使日寇吓得龟缩在据点里，只敢无

目标地扫射了个把小时的机枪。其实夜袭该镇的战斗人员早已撤离了。经过这次夜袭，第二天骑岸镇的日寇10余人就撤回了石港。其他集镇上的日寇也不敢经常出动骚扰了。于是在通中、通西一带就传开了：“游击队来打鬼子了。游击队有几百号人哩！”

夜袭金沙、骑岸的消息传到掘港，费一夫率部收复汇龙镇和施亚夫在通西破坏日寇电线、交通线的消息也传到了掘港。这都说明丁维藩向葛覃报告的情况属实，确有一批人枪，亟待组编成一支部队。于是，葛覃同意成立“特务总队”，并委丁维藩为总队长，发给经费2000元。按葛覃的本意，只要求这支部队承担破坏敌阵扰乱敌人的任务。但丁维藩说共有500余人枪，并且续有增加，要求按一个团的编制组建部队。葛覃对丁维藩一向比较信任，就同意在总队以下编3个大队，1个独立中队。丁维藩取得任命和经费后回到东社，随即派人去启东，委费一夫为“第一大队长”，同时命令该大队迅速来南通县集中；同时，委俞福基为“第二大队长”，并令其迅速集中部队，收复石港。委徐锦标为“第三大队长”、黄刚为“大队副”（进攻南通城和十里坊战斗

后，徐回东社，由黄刚任大队长），并命令他们率部收复刘桥。委姜彬为“独立中队长”，并率部随总队部收复酒店（今西安）。部队西进时，对一路上解散的自卫队，分别由二大队俞福基、三大队徐锦标和黄刚收编。另外，在施亚夫帮助下由王金标集中了唐闸以东的自卫队和部分码头工人组成了“第五中队”，编归“第二大队”；朱德全在唐闸河西集合人枪组成“第九中队”，编归第三大队。丁维藩委派我为“特务总队政训室主任”。实际上，总队部就只有丁和我两个人。各大队奉命收复了各个被敌占领的市镇之后，总队部便设在酒店。这时，“保安司令”葛覃已将“南通常备大队”扩编为“常备一团”，如皋“常备大队”扩编为“常备二团”，司令部直属队扩编为“常备三团”，南通警察大队扩编为“南通自卫总队”。“特务总队”由司令部直接指挥。

5月1日凌晨，葛覃指挥所属部队分三路围攻通城之敌。激战后未能克复南通城，葛覃被撤职查办。葛覃在交卸前把仅有的公款分别交给“三团二长”张星炳和丁维藩。葛覃把3000元交给丁维藩时说：“你有了一支抗日部队，经费再无来源。往后的路程艰难，好自为之吧。”

说起攻城之战，特务总队分工攻打西门，五中队王金标、独立中队姜彬都能率部奋勇拼杀，并非县长彭龙骧向上报称的所谓乌合之众。在这两个中队里，都有红十四军的老战士，他们富有战斗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日寇满怀愤恨，有极其高昂的抗日斗志。攻城时，孙占彪的任务是跟随丁维藩作为预备队驻守西门孩儿巷以接应前锋。孙以不能负阵前驱而不大高兴。撤出战斗后，孙观察了三里岸桥到十里坊一线的地形，认为可在此设伏，出敌不意，乘敌不备，突然袭击敌人的军车。丁维藩同意了孙占彪的请战报告，组成一个36人的突击队，以孙占彪为队长、独立中队分队长苏桃桃为队副，姜彬、王金标在左右两翼配合。5月3日果然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击毙日寇3名，打伤日寇5名，打坏敌人军用卡车一辆、轿车一辆，缴获军用食品、药品西车。

伏击战大获全胜，部队撤到酒店休整。这时，费一夫率特总第一大队200余人枪（有轻机枪5挺）也来到酒店。随之，丁维藩分派各大队去各地驻防：一大队驻陈家桥、二大队驻刘桥、三大队驻石港，总队部仍设酒店，独立中队防守酒店、阚家庵。这时，特务总队在南通县的声势

不小。后来，情况发生一些变化：徐锦标返回了东社老巢，编为当地的自卫队；费一夫投向彭龙骥麾下，加入了“通挥”，特务总队的人员一时减少。但不久施亚夫同志在唐闸从一个仓库里巧计夺得48支枪，成立第十中队，归入二大队。另外南通县三区刘桥、四区酒店、六区石港和二区唐闸、一区城北又有部分地方武装人员参加了特总。特总成立后，由袁政清从江南先后购来轻机枪24挺、重机枪5挺、高射机枪1挺、步枪300余支（最后统计为步枪800余支）、手枪、驳壳枪、手提式共200余支，总计有枪支1000余支。因为枪支都是从二大队经过，可能有截留不报的情况。总之，特务总队已经发展成一支颇具战斗力的部队。它的组建成立，丁维藩、俞福基、黄刚和我，是起过一定作用的。而这支部队的成长，以及后来一部分人员转入革命队伍，却是在我之后参加特务总队的一些老同志、老朋友，花费极大心血，帮助培养、锻炼部队的卓越成果。

袁明同志是我在1938年结识的第一位良师益友。当时我俩都是23岁的年轻人。虽说同龄，但他对部队建设的识见却胜我多多。袁明参加“特总”时，即建议“特总”政训室组织一支宣传队

动员群众参加抗日。丁维藩和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委派他为队长，队员由他去约请。于是，史白、吴维刚、理明、秦佐（姚溱）、赵琅等十多位知识青年先后来到。史白带病工作，首先协助袁明拟订出宣传工作大纲。这份大纲对各方面工作考虑得周详、细致，实际上不仅是宣传队、也是政训室以至整个特务总队的工作大纲。经我推荐，丁维藩不仅完全接受，还特地到宣传队住处向全体队员表示慰问，感谢大家的帮助和支持。

我对部队政训工作可以说一窍不通。这篇工作大纲是供我学习的第一份政治教材，袁明、史白两位也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了。在我对大纲称赞不已的时候，史白同志对我说：“写得好还不够，关键是执行得好。”工作大纲中规定设总务、宣传、军训、民运四个股，工作分工很细。史白在宣传股，带病排演《少奶奶的扇子》、《放下你的鞭子》等戏，还亲自扮演角色。他率队在通县各个集镇表演，激发当地军民加深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增强了爱国意识，效果很好。袁明同志也亲自带队到各处张贴抗日标语、漫画，向广大群众演讲：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一

定会取得抗战胜利。通过这些，提高广大军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此前，敌人下乡骚扰，老百姓只顾“跑反”躲避，经过宣传队鼓动，渐渐也能协助部队打击日寇。如驻唐闸的日军一出动，就有人主动给部队送情报。部队在陈家桥多次阻击敌人，取得胜利。

宣传队不但从事抗日宣传工作，而且还是部队的耳目。老百姓有什么为难之事要部队帮助，宣传队的人员听到了，就会立即告诉袁明，再通过我报告丁维藩求得解决。有两件事，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

第一件：于家园西有个地主，每年灌溉稻田季节都霸住上游水源，不给农民用水，或借此进行敲诈。这年他又故技重演，群众稻田缺水，秧苗几乎枯死。袁明、史白来找我，我立即陪同他们去见丁维藩。丁说：“区长、乡长不归我管，田租、债务的事我也管不着。但恶霸行为我得管。”当即命令我立即派人协助宣传队开坝放水。这件事受到群众称赞，说“特务总队不但打鬼子，还给我们做好事”。

第二件：涉及到丁维藩本人。前已述及，葛覃去职后，特务总队失去经费来源，因而去“自

找财路”。丁维藩绑架了南通西门富商马老五，索款3万元（后来得悉对方出资5万，多2万被调解人中饱）。其后黄刚收复刘桥时，发现几条货船的货主已在日寇侵占刘桥时逃掉。黄刚向丁维藩请示处理办法。丁认为这是从敌人手中掳获之物，可将货物在石港拍卖以充军费，船户放行。我当时建议在上海《新闻报》登个启事，请货主前来认领货物。广告见报几天，仍然无人前来认领货物。估计是货主只怕货未到手反被绑架。于此可见特务总队已是恶名在外了。袁明、史白两人关心“特总”的声誉，向我谈了他们的意见：希望丁维藩筹集经费要取之有道，不可乱来。考虑到当面直言劝阻，丁维藩不能接受，袁、史两位又替我出了不少点子，终于说服丁维藩采取了整饬军风纪律的措施。记得我是从两个侧面打动丁维藩的。第一，由于绑过马老五，俞福基也就效法，借口军用向卞桥乡地主何占梅索取得巨款却未上缴；第二，由于在石港拍卖“无主”货物，第一大队临走时也掳走了棉花船。黄刚、姜彬和负责拍卖的办事处主任余士佳，都曾扣取部分货款中饱私囊。我对丁维藩说：“你是为了筹集军费，两别人却借机谋利。如此上行下效，你既不

能办他们的罪，又不能追他们的赃，你看怎么办？特总声誉堪忧呀！”丁维藩考虑再三，然后表态说：“是我自己把事情办坏了。当时是苦于经费无着，故出此下策，影响了特总声誉。这次我听你的。”于是，他立即召集大队长、中队长开会，宣布：“今后再有人敢于绑票勒索，贪赃枉法，一经查明，一律枪决！”这个指桑骂槐的办法，就是史白同志想出来的。不仅使丁维藩认识了错误，而且还促使他在整饬军风纪方面办了几件好事。

前面提到，丁维藩派袁政清到江南买回很多枪，就想按照一个旅的编制扩充部队，除原有3个大队外，还委了四、五、六、七、八、九、十共7个大队和10个独立中队。周耀南的八大队在姜灶港、张芝山一带搜缴民枪、绑架勒索，当地老百姓说这个大队比土匪还坏。原总队部副官沈步贵，被委为第十独立中队长后，搞到十几号人枪，就在酒店以南为非作歹，民愤极大。还有四大队队长陶济鸣、五大队队长黄味辛在酒店以西、刘桥以东也是专事绑架勒索，名为“指借”买枪，实际上挥霍无度。政训室宣传队向总队部反映以后，丁维藩让我查明严办。结果沈步贵被